



简 报

2012 年第 5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2 年 10 月 10 日

编者按

1. 制度不完善环境下的垄断行业扩展机制..... 乔岳
2. 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与网络外部性..... 董亮 任建新
3. 考虑环境影响后我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研究..... 王奇 王会 陈海丹
4. “两型农业”——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着力点..... 闵锐 李谷成
5. 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郭玉清 姜磊
6. 政府管制对要素收入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平衡..... 申瑜 孙剑平 谢延浩
7. 研发存量、研发经费来源与知识生产效率..... 周密
8. 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中小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选择..... 蒋尧明 章丽萍
9. 公共服务资本化与房价租金背离——基于南京市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 李祥 高波 王维娜
10. 县域财力因转移支付而改善了吗？..... 赵颖
11. 中国最优外汇储备：数量特征、动机分解与调整速度..... 陈奉先 邹宏元
12. 国际碳期货与能源期货的动态套期保值效应探析..... 张秋莉 杨超 门明
13. 风险导向审计、内部控制与审计师行为..... 徐玉霞 王冲
14. 实地实验及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姜树广 谯倩
15. 经济学家眼里的气候变化..... 周五七 聂鸣
16. 国外产业融合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进展..... 单元媛 赵玉林

《经济评论》简介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向《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报刊以及网站经济频道等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把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经济理论探索

1. 制度不完善环境下的垄断行业扩展机制

乔岳（山东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5 期

对于绝大多数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垄断行业改革是亟待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难题，中国也不例外。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总体思路是通过制度变迁解决垄断行业问题。然而，制度变迁的过程可能是相当漫长和坎坷的，而垄断行业所带来的不公平现象在当前却日益严重，其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也不断加剧，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短期内解决的。因此，从垄断行业规制的技术层面入手，通过考察规制者类型对规制结果的影响，以期当前垄断行业的最优规制设计提供技术性建议。

从技术层面而言，规制者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至少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制度不完善造成的生产环境不确定和市场风险等随机干扰，二是会计、审计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进一步的信息扭曲。此外，在一个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完善、政府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监管的动态多期博弈中，作为“规制者”的政府是否可以承诺不利用新获取的信息来损害被规制者的权益，从而造成棘轮效应，比如加重高效率企业的税收负担等，也是值得疑问的。以上问题，无论是从理论分析角度还是政策分析层面都是具有巨大意义的。

以规范的动态博弈分析为基础，结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现实情况，通过比较不同的规制政策，可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既考虑公共利益，又考虑被规制者利益的规制者能够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从而达到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效率，但是这种最优效率是以大量信息租金的让渡为条件的，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不公平。第二，既考虑公共利益，又考虑被规制者利益的规制者能够有效克服随机扰动等不完全信息的影响，从而达到完全信息下的最优效率，但是这种最优效率是以保障被规制者的利益为前提条件的，这在客观上加剧了社会不公平。第三，既考虑公共利益，又考虑被规制者利益的规制者有激励保护被规制者的收益，而不会利用其在动态博弈中获得的信息来剥夺被规制者，从而导致棘轮效应，但这种保护在客观上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平。

因此，垄断行业扩展机制的理论解释如下：相对于那些只考虑公共利益的规制者，既考虑公共利益、又考虑被规制者利益的规制者可以有效避免制度不完善造成的信息不完全和棘轮效应，并因此可以带来垄断行业的更快发展。同时，如何赋予规制者适当的激励和目标就成为垄断行业扩展机制的关键问题。而实际规制权力向地方政府的下放恰恰可以利用地方政府追求产出增长的政绩激励，所以，中国垄断行业领域的规制分权是其得以快速发展的真正根源。但是，既考虑公共利益、又考虑被规制者利益的规制者过于重视垄断者的利益又导致了不公平，造成了垄断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其成为垄断行业扩展过程中诸多问题出现的制度根源。

根据以上结论,可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如果由政府制定规制政策,那么注重长期收益而不是短期利益将是适当的规制政策的前提。第二,在中国现行的制度环境下,如果不考虑现实情况而直接引入独立规制者,很可能会陷入既损害效率又得不到公平的尴尬境地。所以,垄断行业改革必须谨慎前行,慎重选择。

2. 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与网络外部性

董亮 任剑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网络外部性与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

在中国移动通信行业的竞争中经常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形,中国移动会对新入网的用户给予赠送话费或者移动电话等优惠,而中国联通对新用户也有类似的优惠。在竞争更加激烈的时候,甚至还会出现两家公司互相收购对方号码的情形。例如,中国移动的用户如果转投中国联通,那么该用户在享有中国联通对新用户优惠的同时,还可以将他原有的中国移动的SIM卡以某种价格卖给中国联通,这相当于中国联通对从对手厂商那里转换过来的用户给予了更大优惠,当然中国移动也有类似的活动。我们将一行为称为“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

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是当市场中存在着重复购买时,厂商能够根据消费者过去的购买记录对不同消费者提供不同价格,这种区别定价行为有时候也被称为根据消费记录的区别定价或者动态区别定价。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在很多市场上都有应用,例如,信用卡公司有时候会对从竞争对手那里转换过来的消费者提供较低的利率,电力公司也可能对竞争对手的用户收取较低的服务价格以吸引该用户。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电子商务的普及,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可能在更多市场中得到应用。

区别定价通常被认为是垄断厂商利用其市场势力获取垄断利润的一种手段,故反垄断政策和相关法律对区别定价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有时候甚至认为区别定价本质上就是违法的。正如其他形式的区别定价行为一样,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也饱受学者们的诟病。有学者认为,复杂的定价行为可能会掩盖厂商滥用市场势力的事实。然而,陈勇明(1997)通过对双寡头市场上的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行为进行细致的分析后指出,与统一定价的市场均衡相比,双寡头厂商采取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之后,产品价格和各厂商的利润都降低了,但是社会福利并没有增加,原因是由于转换成本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因此,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可能并非厂商获取垄断利润的手段,而是市场竞争加剧的表现。

现有的关于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的研究却很少涉及到市场中存在着网络外部性的情形。网络外部性是西方产业组织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概念,主要用来分析信息技术与网络产品的需求特点。网络外部性是指用户连接到一个网络所获得的效用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用户的数量。用户人数越多,每个用户得到的效用就越高,网络中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正比,这也就意味着网络用户数量的增长,将会带动用户总所得效用的平方级增长。在现实中,很多具有网络外部性的产业中厂商都采用

了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策略，例如长途通讯市场、移动电话服务以及信用卡行业等等。

双寡头厂商在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成熟市场上采取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时，由于网络外部性能够产生某种“滚雪球”效应，会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即具有较大初始市场份额的厂商能够通过制定较高的价格获取更多的利润，其价格和利润会随着市场份额的增加而递增。但是在新兴市场上，由于双寡头厂商同时进入，因此她们会等分市场，此时市场的网络外部性强度成为决定产品价格的主要因素，网络外部性更多地扮演着一个“鞭策者”的角色，使厂商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综上所述，基于行为的区别定价的作用可能并不是掩盖“厂商之间串谋的意图及事实”，而是加剧市场上的竞争，网络外部性则加剧了这一过程。但是，如果该定价方式有可能造成竞争对手退出市场，那么反垄断部门就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在爱尔兰糖业的案例中，法庭判爱尔兰糖业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因为该公司对潜在消费者以及其竞争对手的消费者提供较低的价格，从而排挤竞争对手，损害了竞争。

中国经济研究

3. 考虑环境影响后我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研究

王奇（北京大学）、王会（北京林业大学）、陈海丹（北京大学）

《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研究：1992-2010 年》，《经济评论》2012 年第 5 期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喜人成绩。2011 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1424 亿斤，实现了 2003 年以来的“八连增”。同时，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土地资源不断被城镇、工业建筑挤压，农业生产中的大量劳动力也转移到城镇地区，进入工业和服务业等行业。这时，依靠大幅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来提高农业生产产量的粗放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需要转变为集约的增长方式来提高农业生产质量。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其基本含义是产出增长中无法由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部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表明社会经济利用全部生产要素投入获得产出的能力水平不断提升。近几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约为 2%~6%，即我国农业生产中利用生产要素获得经济产出的能力不断提升。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快于中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不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且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速度也较快。

当前，关于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主要考虑了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的生产要素。事实上，农业生产在获得粮食等经济产出的同时，也带来了化肥流失、农药流失等环境污染排放。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2007 年我国种植业流失的总氮、总磷分别为 159.78 万吨、10.87 万吨，分别占到农林牧渔业和生活氮磷排放总量的 33.8%和 25.7%。包括农业在内的生产活动以及生活活动排放的大量污染物降低了环境质量，这反过来影响到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活动。随着生产活动、生活活动对环境质量需求的不断提高，良好的环境质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稀缺资源，但是很多环境要素的使用是不需要付费的，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机制。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并没有考虑农业生产带来的环境影响，或者说，并没有考虑农业生产中对环境要素的利用能力是否提高。因此，有必要将环境相关变量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框架。将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框架可以更好地度量经济发展质量，通常将考虑了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称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992-2010 年，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 5.61%，而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 5.60%。这表明，在我国农业生产中，传统生产要素利用能力稳步提升。可见，尽管农业生产中的氮磷流失并未完全纳入市场机制，但是，关于这些环境要素的利用能力也有所提升，从而使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未大幅低于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

分区域来看，从东部到中部、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幅由领先变成基本相等、落后于全要素生产率，表明近年来我国较为发达的地区农业生产中环境要素利用能力大幅上

升,超过了传统生产要素利用能力的上升幅度,部分反映了这些地区逐步加大了对农业氮磷流失污染的控制力度。当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业生产中环境要素利用能力上升幅度低于传统要素。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之间的这种差异与美国农业不同时期的农业发展表现出相似的规律,鲍尔(Ball)考虑了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杀虫剂带来的环境影响,发现美国农业 1960-1972 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而 1973-1996 年前者高于后者。因此,中西部地区在进一步提高传统要素投入生产率的同时,也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研发并推广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从而推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快增长。

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之间农业发展的差异以及美国农业发展历史来看,发展前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幅一般低于其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幅将高于其传统要素,农业经济发展的绿色质量将加速提升。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需求采取相应的污染控制政策及举措才能实现。

4.“两型农业”——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着力点

闵锐(中南林业大学)、李谷成(华中农业大学)

《环境约束条件下的中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经济评论》2012 年第 5 期

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关系重大的全局性战略问题。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以不及世界 10%的耕地养活了超过 20%的世界总人口量,为世界的反贫困治理与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国内粮食供求形势依旧偏紧,潜在危机依旧存在,我国粮食安全仍不可高枕无忧。

当前我国粮食需求的刚性增长与紧缩的粮食生产要素供给成为一对较为突出的矛盾。中国仍存在粮食不安全人口,按照比较权威的世界银行对于贫困线的划定,我国贫困人口将超 1 亿。同时,随着经济水平和人口数量的不断提高,作为口粮的直接用粮与食物结构升级的间接用粮双重消费呈刚性增长,至 2020 年我国仍将存在 275.3 万吨的产需缺口,国内粮食增产压力与日俱增。在工业化、城市化逐步深入和推进的过程中,由于粮食种植比较收益下降,多种要素“用脚投票”、自发向效益高的生产领域逃逸,传统农业生产要素呈刚性约束。至此,有学者提出:粮食安全问题不在现今,而在发展的未来!

来自华中农业大学的傅廷栋院士指出,中国 90%的作物种植依赖化肥。的确,近代粮食增产的贡献来源中,农药化肥等化学现代生产要素的作用功不可没,粮食产量的提高意味着更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生产物资的使用,因而对生态环境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生态环境是粮食生产的直接载体,这二者的可持续发展呈封闭式双向关系,即生态环境良好会促进粮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化肥农药的不当使用会使未被完全利用的化学成分随流水污染

土壤及地下水,造成土壤和灌溉用水质量大为下降,生产效率随之降低,对粮食质量安全产生重大威胁,这也成为我国粮食质量安全问题的组成部分。“两型农业”概念的提出与落实,指明了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方向,而粮食生产之于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与人口大国而言,更应该为“两型”理念的践行、为实现我国粮食安全长治久安做出表率。

粮食安全的保障首先要确定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这就意味着在合理的粮食生产增长过程中,除了关注增长速度外,还要注重增长质量,提高粮食生产率迫在眉睫。由此,“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在粮食生产中的应用,则离不开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改善这两大可行路径。相对技术进步而言,中国粮食生产增长更要在技术效率改善方面做文章。原因在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可否认,但当前的粮食生产技术呈稳定成熟状态,短期内实现重大突破不太现实,林毅夫也指出国内利用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的成本较高。更重要的是,在粮食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从“资源节约”角度来看,优化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意味着在既定粮食安全产量的目标下,尽可能节省生产要素投入,这对于我国粮食生产要素刚性约束起到了很好的缓和作用;从“环境友好”角度来看,目前农业生产自身污染的最大来源便是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及不当使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郑风田教授甚至认为当前国内的化肥使用量减少一半也不会影响农业的发展。而从技术效率投入角度,优化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意味着同样的粮食产出,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节约使用,可以尽最大限度降低对环境的伤害。因此,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改善是实现“两型农业”与粮食安全保障相联接的有力桥梁。

5.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郭玉清 姜磊(南开大学)

《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理论与中国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2 年第 5 期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及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1994-2007 年间,全国劳动报酬占 GDP 比例从 1994 年的 53.2%攀升到 1996 年的最高点 56.2%,然后一路震荡走低。自 2002 年起劳动报酬占比加速下降,至 2007 年降低了 11.2 个百分点,降幅达 22.3%。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相反,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猛,特别是加入 WTO 后,FDI 以年均 10.2%的涨幅递增,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 FDI 接受国,对国内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不难引发如下疑问: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外资是推动还是遏制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经历了线性还是非线性的演化规律?

我们的理论预期是,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未必是线性的,在东道国引入 FDI 的初期,就业效应或将超越技术效应从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其后 FDI 引致的技术扩散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将使技术效应超越就业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形成负面影响,这意味着 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将经历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的交替主导局面。事实上,1996 年成为中国前两

个历史阶段的拐点。在中国劳动力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始于1980年代涌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技术含量低、附加值较少的加工组装环节雇佣了大量城市和农村的非熟练工,使就业效应超越技术效应,推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在此过程中,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设备、销售渠道、品牌等优势与中国劳动力、土地成本、基础设施等优势互补结合,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低成本加工制造基地。但随着外资吸引就业量逐步趋于稳定化,以及融于外资的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转移扩散和尖端机器设备与自动化操作流程的吸收引进,技术效应逐渐超越就业效应,使收入分配向资本要素倾斜,并对劳动收入份额带来不利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东部省市凭借沿海区位优势 and 优惠政策环境吸引了大量外部投资,创造出众多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就业岗位,不断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从西到东的区域性迁移流动,这使FDI的就业效应更具持续性。在东部省市中,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增长极是吸引外资和内陆地区劳动力流动相对集中的区域,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了技术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冲击。反观中西部省市,近年来,FDI的技术效应已经超越就业效应,对中西部劳动收入份额带来不利影响。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是,应如何应对近年来FDI的技术效应超越就业效应,使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如能强化其就业效应,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提高劳动要素报酬,技术效应的负面冲击就能被削弱。从区域产业布局来看,东部省市面临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严峻压力,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应从生产环节的资本和技术引进逐步转向产品研发,从而在生产价值链上获取更多份额,塑造新的国际分工优势,提高劳动要素收入。东部还应利用人才集聚、生产中的干中学和优质教育资源形成的人力资本优势,主动实施将外资依附技术调整为劳动密集型适宜技术的研发创新,吸纳由于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和土地集约经营所释放出来的更多农业劳动力参与就业,或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随着东部土地、工资、能源运输等成本不断上升,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进行梯度转移将成为理性选择。中西部应逐步放宽引资门槛,积极承接东部省市的产业转移,通过同本地产业相互链结形成所谓的“雁形”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不仅要在市场整合方面“做对价格”,更要在劳动密集型适宜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方面“做对激励”,双轨并行的调控举措将有利于抑制近年来FDI技术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形成的负面冲击,缓解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

6. 政府管制对要素收入的影响: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

申瑜 孙建平(南京理工大学)、谢延浩(南京审计学院), 《经济评论》
2012年第5期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成因,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其焦点是市场化是否为关键性成因。对此关键性成因的不同判断派生出不同的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对策:肯定论者主张加大行政管制,否定论者则呼吁更多的市场自由。

在肯定论者看来,市场竞争机制导致市场集中度提高,在造就资本回报甚高的垄断企业的同时,也造就资本回报逐年下降的非垄断企业和劳动要素收入逐年下降的劳动者,因而市场化推进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在时序上具有一致性。扩大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行政管制的强度,可以控制乃至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而在否定论者看来,政府更多的行政管制将导致市场更甚的扭曲,从而形成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给市场以更多自由,才是遏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关键性举措。

至少在我国现阶段,肯定论者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行政管制成为劳动要素收入差距拉大的显著性原因。研究发现,劳动要素的收入以行业差距最为显著,而这主要是行政管制的衍生品。烟草、管道运输、通讯、金融和保险等行业收入的不断提高,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这些行业无一例外都具有行政垄断性质,是行政管制的产物,而非市场竞争机制所致。这些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企业,一方面牺牲消费者利益以增加其收益,另一方面占有国家资源的无偿或低价使用权。在这些行业就业的劳动者也依其级别,分享着部分甚至全额与行政管制有关的租,从而形成较之在非行政垄断企业的相同素养劳动者的显著性收入差距。

第二,行政管制也是资本要素收入差距拉大的显著性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存贷款过大的利息差距,二是行业间资本收益差距。存贷款利息差折射的现实是,由于利率非市场化,银行准入门槛高,行政管制界定的存贷款息差大,数量相同的资本要素,在居民的存折上收益微乎其微,而在银行手中却可以获得高额收益。行业间资本收益的差距,主要还是体现在上述行政垄断型企业而非行政垄断型企业之间。

第三,行政管制还是居民拥有的不同要素收入差距拉大的显著性原因。以资本和劳动这两种要素为例,从直观上看,自 80 年代催生劳动力市场以来,尤其是 1998 年之后,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1998 年,跨省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其总体的 3.885%;至 2006 年末,跨省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 47852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 90.1%),使得劳动要素的收入,特别是农村劳动要素的收入得到了明显提高。居民手中持有的、依靠劳动收入累积起来的资本要素的收益却微乎其微。

我们的结论是,至少在我国现阶段,更多的市场自由、更少的行政管制,更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7. 研发存量、研发经费来源与知识生产效率

周密(南京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5 期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已位列全球第二,经济增长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我国经济的增长绝大部分仅局限于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总量的增加依托于丰富的资源总量和巨大的劳动力存量,这种经济的增长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如何凭借自主创新在目前全球经济低靡的氛围中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自主创新,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刻不容缓。

笔者主要借用 Griliches(1979)知识生产模型，以 R&D 投入存量的视角，以 2001-2010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 GMM 方法，分析专利技术产出类型的差异化现象，同时国家的创新研发行为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宏观支持，在已有的分析基础上分析政府支持政策对专利形成所带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根据研发强度以及各省区市研发强度的变动路径进行分类，造成差异化原因主要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差异，高强度研发省区市是我国高校以及研究性机构聚集的地区为研发提供了人力资本，这些地区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资金实力雄厚的地区，同时由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支持，这些地区也吸引了国内外的其他地区的高尖端人才和大量的资金流入，这样形成研发的“马太效应”，也是导致我国研发内部差异巨大的重要原因；在中等强度研发省区市，资金和人力资本中具有至少一个方面的优势，通过一个研发优势来引进另一个研发要素，促进研发的发展；弱研发强度则在资金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都不具备优势条件，本地区的人力资本大量外流，同时由于资金条件的不足，形成研发中的“恶性循环”，迅速加大与前两个研发强度地区的差距。

第二，R&D 存量与知识生产效率。从 R&D 资本存量来看，除外观设计型专利的产出弹性较低外，其他三类专利的产出弹性基本一致。2001-2010 年发明型技术专利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36.78%，实用新型技术专利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18.09%，验证了数据模型的有效性。从人力资本来看，R&D 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都显著，其中发明型技术专利的 R&D 人力资本投入产出弹性最高，实用新型技术的产出弹性最低。在技术的研发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可以解释大部分的产出，同时也说明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空间。知识产出模型的解释力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选定的解释变量与知识、研发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第三，筹资途径与知识生产效率。科技活动经费中来自政府部门部分的经费对三类专利技术申请数的作用均显著，其中实用新型技术专利的政府资金产出效率最高。一方面是与其它技术专利相比，实用新型技术专利对可以更有效地满足当前人们生产生活的要求，而发明型技术专利的产出弹性效果不如其他类专利的产出弹性明显，这也是中国每年专利的申请情况虽然位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前列，但是研发创新的生产率依旧比较低的原因。

结合欧美等后工业国家的发展经验显示：首先，政府在整个国家 R&D 经费投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因为，在研发活动中存在着一些基础性研究、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研究以及公益性研究等，这些都需要政府投入经费予以支持。其次，从长远来看，企业毫无疑问将最终成为 R&D 投入的主体，这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虽然在我国研发过程中，企业的重要地位在逐渐凸显，但是目前企业整体实力仍然很弱，因此政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还是需要保持一个较大的投入力度。我国要真正实现自主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在此基础上，政府

还需要利用公共支出手段,对原创性的、风险大的发明型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支持。

8. 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中小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选择

蒋尧明(江西财经大学)、章丽萍(江西财经大学、华东交通大学)

《中小企业高层管理者特征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基于管理防御理论的分析》,《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

增长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企业追求的目标。而过度的增长会使企业财务资源严重匮乏,往往导致企业破产或产生财务危机。另外,增长过慢,又可能抑制企业资源的有效利用,进而丧失增长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同样会导致破产或发生财务危机。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管理决策,而不是外在因素。由于高管是企业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高管的认知基础、价值观、洞察力和这些特质的作用过程是影响组织战略制定和决策的关键因素。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普遍历史较短,多数由那些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经营能力很强的企业创始人直接掌控。作为企业创立者或者与创立者有密切关系的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经营管理有先天的控制权,他们决定着企业的战略、财务、经营决策。而且,中国的中小企业往往处于发展的初期,作为企业创立者或者与创立者有密切关系的高层管理者拥有更多的所有权益,因而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因此,针对中小企业高管特征对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客观地分析影响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这对于帮助我国中小企业应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实现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高管人口背景特征如年龄、教育水平、任期、专业背景、社会背景和性别等对企业决策以及公司绩效、企业成长、创新绩效等的影响,而人口背景特征如何作用于企业行为、进而影响相关绩效的作用途径和作用机理尚缺乏研究。另外,管理防御作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涉及到管理者更深层次的内心想法,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财务决策行为,且管理者的背景特征直接影响到管理防御程度。因此,要明晰高管特征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更好地揭示企业增长动因,必须从管理防御的角度出发,将财务决策行为纳入高管特征对决策行为影响的研究范围,研究高层管理者特征对财务决策行为进而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为此,基于管理防御理论,结合高阶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管理特质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我们建立了管理防御下中小企业高管特征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模型,即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管理者决策行为特别是财务决策行为的影响,而管理者决策行为受到管理者的认知基础、价值观念和信念的影响;管理者的认知基础、价值管理和信念会受到管理防御的影响,而管理特征直接关系到管理防御行为。从而明晰了管理防御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机制,将高阶理论中的有限理性和自由裁量权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2006-2010年中国中小企业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我们从管理防御的角度出发,系统考察了高层管理者特征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实现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

高管年龄的增大,企业越容易实现可持续增长;而当年龄超过一定界限时,可持续增长反而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越难实现。(2)中小企业高管教育水平越高,实际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的差异越大,越容易造成企业过速增长。(3)高层管理者任期与企业可持续增长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4)高层管理者专业背景和社会背景与企业可持续增长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有呈负相关关系的趋势。

因此,在管理层的构建过程中要注意新老高管的交替,适当扩大中年高管的比例,同时要不断提升高管的教育水平。这些研究结论对中小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9. 公共服务资本化与房价租金背离——基于南京市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祥 高波 王维娜(南京大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

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纷纷花大力气推进本国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党的十七大则把“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确定为深化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针。2011年全年国家公共财政收入103740亿元,增长24.8%,在公共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财政加大了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文化等的支持力度,全年全国财政支出108930亿元,增长21.2%,其中教育支出16116亿元,增长28.4%;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增长32.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144亿元,增长22%,财政支出将越来越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现代政府所追求的目标。

城市的宜居性是吸引人口流入的主要因素之一,公共服务水平、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等则是城市宜居性的重要体现。人口的迁移容易引起城市人口数量与结构的改变,从而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人均居住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住房的消费将逐渐从数量转向质量,居民对住宅的区位需求将更多地向多元化发展。作为政府提供的主要公共物品,住宅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必将影响居民对其的消费意愿。

既有研究较多地关注公共服务对房地产销售价格的影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均已证明了公共服务对房地产销售价格确实存在资本化的现象。房地产的租赁价格同样是房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共服务对房地产租赁价格的影响方面,相关的研究尚比较缺乏,公共服务对房地产租赁价格是否存在资本化现象还没有一致的结论,公共服务对房价与租金的资本化是否存在差异?联想到当前我国一些城市存在的房价租金比不断扩大的现象,公共服务的资本化是否与房价租金比不断扩大有所关联?

利用南京市江南八区近万份的调查数据,我们建立特征价格模型,研究实证检验了住宅

周边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对其销售价格与租赁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住宅的物理特征指标与住宅周边的公共服务水平对房价存在资本化的现象，房间数目、大厅数目的增加与装修程度的改善将提高住宅的销售单价；四类公共服务中，教育公共服务与生态环境对住宅销售价格的影响最大，交通条件与医疗条件对住宅销售价格的影响最小。第二，公共服务同样资本化进了住宅租赁价格中，但是住宅的物理特征指标对房价与租金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房间数目、大厅数目等特征变量的提高倾向于降低租金单价；与其他特征指标相比，租金对住宅装修程度最为敏感。第三，政府对城市核心地带公共服务的投入并不会导致当地房价租金比提高，相反，政府对城市边缘地带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则将使得当地的房价租金比提高，暗示了房价租金比背离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要求政府有必要推进城市内部各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证研究结果一方面为合理制定租金提供了有效的证据，另一方面也为探寻我国一些城市存在房价租金不断扩大甚至背离的现象给出了新的解释。

10. 县域财力因转移支付而改善了吗？

赵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转移支付与县域财力的分化》，《经济评论》2012 年第 5 期

县级财政是我国财政体系中较为薄弱的部分。首先，其承受着较大的支出压力。1999 年县级总支出的 40% 来自于转移支付，而国家级贫困县甚至高达 61%。其次，收入来源却较为有限。2003 年，全国县级财政总收入的基尼系数是 0.4812。其中三大地域内的收入差距是导致这种较高基尼系数的主要原因。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容易导致支出责任难以全面有效实现的局面，阻碍着辖区内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在此情形下，转移支付数量和方式的确定对县域财力的改善和政府职能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为实现公平目标，需要对转移支付总量和结构进行有效的安排。与此同时，发展仍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转移支付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快速发展地区的积极性，引导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并逐步通过涓滴效应带动后发地区的发展。为实现效率目标，也需要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对转移支付制度进行科学设计。

随着县域数据的获得性条件逐渐改善，以及对省以下转移支付问题的重视，县级财力均等化效应也开始得到一定的研究。Kai（2005）和尹恒等（2007，2009，2011）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使用收入极化指数及一般分解形式，关注 1993-2003 年转移支付对县域经济财力性总额分配过程的差异性影响，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就转移支付对县域财力的再分配效应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也对既定年份各分位组上转移支付对县域财政的具体影响进行了测算。分析的展开，以测算转移支付对县域财政收入差异的贡献率与边际效应为主要工具。

就转移支付的总量而言，其对县域财力呈现出较为正面的改善作用。1993-2003 年，转移支付对全国各县收入水平的总体改善水平较为显著。东部地区由于税收返还，西部地区由于专项补助和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的极化分布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在此过程中，中

部县域财力出现了塌陷：总量上较东部各县域财力相去较远，增量上也难以和西部地区各县域相比。这使得中部地区县级财力约束呈现出更强的刚性。

就转移支付的结构而言，按照地域和收入组分组方式的结论基本一致：专项补助、一般转移支付补助、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以及消费税和增值税返还在全国整体范围内对县域财力的影响较大。特别是专项补助对县域财力分化的贡献度最大，其贡献程度为 31.97%，在三大地域内的峰值为 51.31%。由于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性措施，此种类型的转移支付又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或缺的。

就转移支付对县域内部收入各层级之间的影响而言，2002 年和 2003 年的转移支付，改善了较为贫困县域（七分位组以下）的财力。就十分位组上各层级县域的转移支付影响而言，在全国范围内，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和原体制补助对特定收入组的县域财力差距具有缩小的作用，但是对各收入组的影响方向却不尽相同，影响程度也较为有限。随着东中西的地域区别，受益的收入组也逐渐下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全国范围内 2003 年的转移支付对县域财力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影响。

因此，在转移支付制度改善的过程中，应该充分注重各类型转移支付在地域、分位组以及时间上所可能具有的差异，在总量增加的同时更加注重结构性的调整，真正促进县域财力的均衡发展，从而保障农村基本公共品提供的均等化。此外，如果能够进一步就水平转移支付推动基层政府间的深化合作，那么对较弱县域财力的改善将具有更加显著的意义，也将有效缓解县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压力。

11. 中国最优外汇储备：数量特征、动机分解与调整速度

陈奉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邹宏元（西南财经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5 期

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数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传统理论认为，当经济体选择更为浮动的汇率制度后，一国所需的外汇储备量将会减少（此处不妨将“所需的外汇储备”理解成“最优的外汇储备”）。国内外的研究普遍表明近年中国的汇率体制（汇率生成机制、波动区间）确实在走向浮动，但中国的实际外汇储备数量却也在不断攀升。仅凭这一事实尚不能断定中国发生了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问题。因为实际的外汇储备数量不等于最优的外汇储备数量。那么接下来产生一个问题：如何得到最优的外汇储备数量呢？

早前的经验比率法、成本收益法存在各自的缺陷，难以用于确定最优外汇储备数量。目前较多地直接使用回归分析法往往以实际外汇储备值代替最优值，难以“自证清白”。比较符合外汇管理当局“经济理性”的局部动态调整模型（Partial Dynamic Adjust Model）可资借鉴。实证考察发现：（1）中国的最优外汇储备模型中体现出外汇管理当局持有外汇储备的“交易性动机（满足国际贸易和债务偿还）”、“预防性动机（预防资本外逃和国际收支波动）”、“重商主义动机（利用汇率获取竞争优势）”、“攀比动机（以外汇储备作为实力的‘信号’，转嫁

投机风险)”,同时受“汇率因素”的影响。(2)样本期(1992-2010年)内中国不存在储备不足的问题。在1992-1994年间,中国的最优外汇储备和实际外汇储备数量非常逼近,随后1996-2002年二者之间的差距(缺口)也非常平稳,只是在2002年以后中国的实际和最优外汇储备出现明显的向上凸折,但二者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以2010年第四季度为例,中国最优外汇储备约占实际外汇储备的54%。

针对第一个发现,进一步考察诸动机对中国最优外汇储备的绝对和动态影响时可以看出,对中国最优外汇储备数量影响最大的是交易性和攀比性动机,而预防性动机也在迅速攀升。西方批评中操纵汇率的理论基础——“重商主义动机”实际上对中国最优外汇储备影响微乎其微。“攀比动机”往往在危机之后的数年对最优外汇储备数量产生持续、显著的影响,但在平静期内,其影响微弱,这说明货币当局存在“好了伤疤忘了痛”的现象。同时“汇率因素”对中国最优外汇储备影响甚小,这可能源于汇率波动区间仍有限的缘故。

针对第二个发现,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何中国的最优外汇储备数量在2002年以后迅速攀升呢?对此,可以用动态调整模型的调整系数 λ 予以解释。一般而言,该系数越高则说明货币当局可以更为迅速地将实际外汇储备量调整到最优水平上。通过纵向对比,不难看出中国该系数值甚至低于印度。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的 λ 系数如此之低呢?其一在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模式,既往的持续盈余会使系数越来越小;其二是中国现行的结售汇和汇率体制导致外汇供求弹性不足;其三则在于汇率本身的弹性不足。

既然如此,减少实际所需外汇储备数量的关键在于切实有效地提升 λ 系数。具体如何提升该系数呢?宏观层面,继续扩大内需减少外部依赖。中观层面,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生成机制,扩大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区间。微观层面,渐次取消居民结售汇障碍,使汇率波动更充分地体现出外汇供求的影响。

12. 国际碳期货与能源期货的动态套期保值效应探析

张秋莉(北京银行)、杨超(北京交通大学)、门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碳市场与能源市场动态相依关系研究与启示——基于DCC-MVGARCH模型》,《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

由于碳交易兴起及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与日俱增,全球碳交易市场主体表现出了多元化特征。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一方面开展碳金融投资工具的创新,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减排实体提供碳金融产品及碳信用评级担保;另一方面,直接向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实体注入资金和技术进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合作开发,由此又可以为发达国家的排放实体提供二氧化碳减排量,帮助其完成减排任务。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不仅我国政府应加快建立健全以自愿减排市场为核心的自主碳交易体系并着手实施碳资源战略储备,我国企业也应主动摆脱远期开发合约束缚以规避碳排放权价格的波动风险。

碳交易是国际社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并探索低碳经济发展而进行的金融创新,它是以

市场机制敦促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较低的成本共同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为最终目标。在此可以认为,温室气体排放就是由经济活动过度消耗能源而导致的外部成本。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去库存化与需求弹性等因素的影响,能源价格上涨说明企业的能源消费需求正在不断上升,其扩大生产活动的意向较为强烈;而企业生产活动增加会直接导致碳排放量增加,企业对于二氧化碳减排量(EUAs 或 CERs)的实际需求必然会上升,这最终会使二氧化碳减排量的价格趋于走高。上述粗犷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碳资产与能源资产之间的价格相依关系。部分文献也发现碳价格会与能源价格同方向变动,可都是基于欧盟排放配额(EUAs)价格开展的研究,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是 CERs。鉴于此,笔者选用恩格尔在 1992 年构建的动态条件相关多元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DCC-MVGARCH)探析国际能源市场与碳市场之间的联动效应。因考虑到金融资产收益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笔者引入多元 t 分布对模型加以改进。这个模型可以充分利用碳资产与能源资产的价格和波动信息计算动态相关系数,挖掘并直观地反映两类市场之间的动态相关性。

为此,以欧洲气候交易所公布的 DEC10 期货合约以及国际 BRenT 原油期货合约、Euro 天然气期货合约、GlobalCoal 期货合约为研究对象,我们选取 2008 年 3 月 14 日至 2010 年 8 月 16 日、2008 年 12 月 5 日至 2010 年 8 月 16 日两个样本空间分别进行分析。通过适当的计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碳期货与三类能源期货之间都表现出了正向的动态相关关系;相较于 Euro 天然气期货合约和 GlobalCoal 期货合约,BRenT 原油期货合约更适合于构造套期保值组合;以 DCC-MVGARCH 模型估计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并测算套期保值比率,能够明显降低投资组合收益的方差,同时也提升了投资组合收益的均值。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政府和企业应互相配合、共同努力:首先,国内减排企业应当采取相应的套期保值策略。应以 CERs 期货的主力交易品种的结算价作为现货价格的直观参照,充分认识到国际原油期货市场同 CERs 期货市场的正向关联度最明显而且稳定。同时,基于动态条件相关系数的均值及收益波动进行预测,根据现有 CERs 持有量调整原油期货合约空头,并定期更新动态条件相关系数的均值。其次,政府主管部门应当着手实施碳资源战略储备以对冲风险。政府主管部门一方面可适当放宽质优减排企业的准入门槛,允许其审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另一方面,可组织具备资质的国内大型企业开展自愿碳减排交易实现国内碳减排量的集中与整合,同时建立碳价评估体系,形成较为完备的风险识别机制与风险预警机制。以此为参考,适时调整国内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批准进程与审核标准,收紧项目批准指标,只允许具备运作经验且实力雄厚的企业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开发,引导更多不具备运作经验的中小企业投身于自愿减排交易。

13. 风险导向审计、内部控制与审计师行为

徐玉霞 王冲(厦门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5 期

传统的审计主要由抽样测试和抽查组成，它们的存在价值取决于所谓的内部牵制和控制。21 世纪以前，内部控制与审计的研究多集中于规范领域和单纯的数学分析，内容也大多与审计实务紧密结合。学者们主要关注审计师如何评价企业内部控制，如何利用内部控制制定审计计划等问题。近年来，随着国内外一系列财务舞弊案的爆发，美国《萨班斯法案》（2002）的颁布，中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08）及其《配套指引》（2010）的出台，内部控制已经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之一，特别是自美国 SOX 法案颁布以来，随着内部控制信息的强制披露的兴起，内部控制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但目前的内控话题多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及其市场反应直接相关，人们对后 SOX 法案下的内部控制与审计之间的关系似乎缺乏关注，学术界一致缺乏对于内部控制与审计之间关系的理论梳理。内部控制在审计中的角色是什么？内部控制是否可以影响审计师的行为？这些问题还一直有待经验数据的检验。

我们尝试从风险导向审计中审计风险的基本等式出发，从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两个维度探寻了内部控制影响审计师行为的基本路径。理论上，一方面，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增强了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降低了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也降低了审计师预期损失费用（包括诉讼损失和恢复名誉的潜在成本），从而会导致审计费用低。另一方面，出具标准意见对于审计师而言是有风险的，针对内部控制较好的企业，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可能更低，因此，这类企业更容易被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为了证明上述理论假设，我们梳理了内部控制影响审计师行为的作用机理，通过数学建模和实证检验，证实了内部控制对于审计风险降低的作用，进而影响审计师的实际行为，即：审计师向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收取了更低的审计费用，同时也更倾向于出具标准意见。

研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厘清了内部控制影响审计师行为的传导路径。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审计师更关注自身审计风险的大小，内部控制的完善降低了审计师的审计风险，减少了审计师的未来审计失败的预期损失，从而降低了审计师收费。并且通过这种效应，降低了审计师出具标准意见的未来风险，从而增大了审计师出具标准意见的概率。（2）研究了内部控制和审计费用之间关系。在国内现有文献（杨德明等，2009）中，已有学者检验了内部控制和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但是内部控制和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尚缺乏实证检验，我们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3）研究结论支持了我国内部控制管制改革，为解决内部控制建设的成本收益之争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建设内部控制不能只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更要综合考虑完善内部控制为企业带来的短期乃至长期的收益。

理论前沿动态

14. 实地实验及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姜树广 谯倩（山东大学）

《实地实验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经济评论》2012 年第 5 期

实验是科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一直致力于使用严格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问题，实验经济学正是经济学向科学化发展的产物。通俗地讲，实验经济学就是挑选一定的人群作为受试对象，研究特定控制环境下的经济决策问题。最初的实验主要是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的，最近十多年来，经济学家开始大量操作实地实验，将实验室中严格的控制方法推广到实际的经济环境中去。实地实验方法主要是通过一定的自然人群中随机选择受试对象，将其分成实验组和对比组，给实验组外生的干涉或冲击，观测两组对象行为结果的差异，以得到因果关系并用于检验经济理论或政策效果。实地实验的魅力还在于它同时是一种创新的研究方法，可以创意实验设计，观测实验过程和分析实验结果以发现和发展新的经济理论。

作为一种实证研究方法，与实验室实验、自然实验和使用自然生成数据的方法等相比较，实地实验一方面比较贴近现实，另一方面又可以进行较严格的控制，因而是一种兼具因果联系明确和普遍适用性（即内部和外部有效性问题）的方法，填补了实证研究的中间地带。当然实地实验也面临不少局限性的问题，主要包括可复制性问题、识别因果的困难、合作限制和伦理问题的限制等。

实地实验可用于几乎所有经济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三个方面得到了加速的增长：一是用来揭示可靠的因果关系，二是从事原始数据的收集，三是与实业家和政策制定者更普遍的紧密合作。目前使用实地方法研究的现实话题涉及教育、农业、金融信贷、就业歧视、腐败、慈善等众多领域，其对发展中国家一些重要现实问题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现在由麻省理工大学的贫困行为实验室、加州大学的全球行动评估中心以及贫困行动创新组织等与各种机构合作操作的数百项大型实地实验正在各主要发展中国家进行，并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

以达芙萝等（Duflo, et al., 2010）与印度的一家非政府组织合作在印度农村小学教师中实行的一项“照相机实验”为例简要介绍实地实验的具体应用。研究者选择了 120 所学校参加实验，随机选择其中 60 个作为实验组，给每个教师一个具有时间证明功能的相机来记录到校情况，根据记录有效天数给教师提供奖金（每天 50 卢比）。另外 60 所学校作为对比组，直接付给教师 1000 卢比并告知他们将会因为糟糕的表现被解雇，每月有一次突击检查教师的缺席情况。与对比组相比，实验组教师在出勤方面产生了立刻并持久的改进，表明一个直接的激励项目有效降低了学校老师的缺席率。这样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进行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薪酬激励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身处改革阶段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实验场，社会转型中面临大量纷繁复杂的问题，

为进行实地研究提供了无限丰富的题材。很多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项政策措施是否有效，一个试点改革是否起到了预期效果，往往在多重因素环境下难以判断，而实地实验科学严格的方法，对于检验处置效果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我国面临的严峻社会问题，如怎样预防和治理腐败？如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有效解决？如何激励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员工……重大的现实问题如教育、医疗这些体系的症结在哪里，如何有效改革？这些都可以成为实地实验很好的应用研究对象。

开展实地实验，需要经济学者深入到具体的经济实践中去，积极与各级政府机构或实体企业寻找合作的机会，结合具体情况恰当地设计或选用某种实验策略。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政策试点，研究者可以结合政策的执行进行适当的实验设计，将要考察的问题与政策结合起来，通过跟踪政策过程，一方面可以发现或检验经济理论，另一方面也可以验证政策的有效性。实地实验应该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 and 政策实践中得到推广和兴盛，为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15. 经济学家眼里的气候变化

周五七 聂鸣（华中科技大学）

《碳排放与碳减排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综述》，《经济评论》2012 年第 5 期

当今时代的发展特征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即平、满、热。说世界是平的，是因为全球货物、资本、人员的流动障碍越来越少，人们可以真实感受到一个“地球村”的存在。说世界是满的，是因为人们对资源的开采与使用及其引发的环境负荷已经达到了极限，能源危机与环保事件成为媒体的核心话题。说起世界是热的，那当然是温室气体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很多人以为气候变化自然是科学家们的事，似乎与经济学家扯不上边儿，但是，使气候变化成为政府、企业、百姓普遍关心的焦点话题，却与经济学家的贡献分不开。

科学家关心气候变化，是因为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过快增长，使地球表面显著增温，从而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1988 年 11 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和环境规划署联合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简称 IPCC），整合全球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评估，先后于 1990、1995、2001 和 2007 年发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2007 年报告显示，全球气温上升非常有可能由人类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这种可能性达到 90% 以上。IPCC 评估报告成为国际社会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科学依据，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和全球温室气体减排。

科学家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全球生态系统演化规律的综合研究上，但是，如何综合评估气候变化给人类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来防范或减缓这种影响，这些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就业与收入，科学家们似乎拿不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这在一定程度削弱了普通大众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关注。科学家习惯于从过去的事实中总结规律并预测未来，然而，普通民众的消费心理变化、技术变革的

不确定性、企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等是他们难以预测的,经济学家似乎更擅长处理这些事儿,不过,经济学家喜欢争议也是众所周知的。

许多人天然地以为化石能源会越用越少,能源危机日益迫近,早在 1972 年,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罗马俱乐部,抛出名为《增长的极限》这么一本书,说资源枯竭会使全球经济停滞,1992 年又发行《超越极限》,再次对全球性资源危机发出警告。事实上,他们忽略了技术进步及新能源技术发展,新能源技术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中任何一个重大技术突破,都有可能带来一次新能源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化石能源的稀缺性本应成为倡导人们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依据,但不应成为人们发展经济的担忧。耶鲁大学的经济学者诺德豪斯从模型技术分析上反驳了罗马俱乐部的观点,认为考虑到技术进步与市场的作用,罗马俱乐部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事实上,人们真正需要担忧的不是资源的稀缺性,而是资源的使用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因为环境承载力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其后果也是难以预测的。化石能源消费最大的环境损害就是碳排放引发的温室效应,与其他温室气体比如二氧化硫相比,二氧化硫的排放具有区域累积性,对区域建筑物及人体健康会产生显著影响,而二氧化碳排放具有空间扩散性,一地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对本地增温效应不明显,因此,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明显的全球负外部性,解决这种负外部性离不开全球合作。

然而,当政治家们坐在一起谈判全球碳减排时,他们遇到了难以调和的问题:各国共同参与减排还是区别对待、趁早减排还是逐步减排、征收碳税还碳排放权交易等。极力减排的国家担心不减排国家产生的碳泄漏以及不公平竞争,因为减排需要投入成本。低碳技术领先的国家主张趁早强力减排,发展中国家则要求逐步加强减排。政治家们的分歧也伴随着经济学家的争议,诺德豪斯认为“减排不是一个紧急行动”,可以先缓慢减排而后逐步加强减排力度,然而受英国政府出资委托、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却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这种观点“在道德上是不可饶恕的”。斯特恩主张综合使用行政管制、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等减排手段,诺德豪斯认为碳税政策最为可行、最有效率。

以斯特恩和诺德豪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议反映了欧洲和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治分歧,欧洲国家以低碳先行者的气度极力主张强力减排,美国人则显得有些底气不足而又瞻前顾后。当然,经济学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争议比没有争议要好,这些争议使普通大众有机会更深入地理解碳减排,并听取不同学者的声音,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争议尽快统一起来,而不是任其悬而不决,这是摆在全球经济学家面前极富挑战的事儿,也是考量全球政治家们政治智慧的事儿。

16. 国外产业融合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进展

单元媛 赵玉林(武汉理工大学),《经济评论》2012 年第 5 期

产业融合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管制的放松,改变了原有产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

从而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甚至于重划产业界限。产业融合是现代产业发展的一种新的特征和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成为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难点问题。关于产业融合的思想最早源于1963年罗森伯格(Rosenberg)对美国机械设备业演化的研究。学术界对产业融合的讨论则开始于尼格鲁庞第(Negreouponte)关于数字技术的出现导致产业之间交叉的开创性思想。此后,许多学者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广泛开展对产业融合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产业融合可从三方面进行分类,途径有三种:一是以市场需求为主线形成的路径。斯蒂格利茨(Stieglitz)指出无论是技术融合还是产品融合,都包含了三个独特的阶段:产业间从供给到需求都不相关;产业边界、市场结构和公司行为开始变化,产业间出现融合;两个产业的技术或产品市场具有相关性,并且市场稳定化。二是以知识扩散为主线形成的路径。海克林(Hacklin)等将融合分四个阶段:知识融合、技术融合、应用融合和产业融合。三是以科学技术交叉渗透为主线形成的路径。卡然(Curran)等提出产业融合发展的理想化时间序列:跨学科引用的科学融合导致技术融合;新的产品-市场结合带来市场融合;企业开始相互介入,最终产业融合。

学者们从全球市场上产品组件的普遍存在、技术解决方案之间的交叉接口、建立创新合作的商业机会、顾客对全面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的需求、管制环境的变化等多方面探求产业融合的驱动力。基本达成三点共识:管制的放松、技术创新和扩散、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在产业融合中起到相关但却截然不同的作用。产业融合经常是技术和商业模式之间互动的结果。

产业融合的识别与测度方法有:(1)融合迹象的识别。以现有国际标准产业分类(SIC)和国际专利分类(IPC)为基础,通过SIC代码之间越来越多的重叠以及IPC代码之间相互的引用中发现融合的迹象。(2)以专利系数法测量产业融合的程度。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中的相关系数分析法来检验产业相互之间专利份额的相关系数,以此判断产业间技术融合趋势的存在性。(3)测度产业融合程度的其他方法。有赫芬达尔系数、熵指数、集中度和剩余法等。

产业融合使产业间边界消失,给企业带来挑战,迫使他们面临新技术、新顾客和新需求。产业融合对经济增长、产业组织、企业战略等方面的深刻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关于融合效应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融合可能导致新市场进入者的爆炸性增长,另一方面,融合又巩固了市场。总的来说,产业融合的效应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形成新型竞争协同关系;(3)是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

总体看来,国外学者近年来对产业融合的相关问题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案例分析、实证描述,而是进行具有一定抽象性的理论分析,研究从早期的限于信息通信领域的讨论逐步扩展到了更广泛的产业领域。研究内容也已经从分散讨论逐步过渡到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探讨。但产业融合是在产业的边界界定清晰的前提下发

生的现象,到目前为止,研究都还处于初期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产业融合理论。有关产业融合的途径、测度、效应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拓展。产业融合的国际比较研究是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进行不同国家产业融合成长的比较研究,以进一步验证产业融合带来的经济效应。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自1980年创刊以来，本刊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本刊设有中国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经济理论探索、理论前沿动态、新书评介等栏目，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CSSCI来源期刊。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和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态势，《经济评论》适时调整和更新研究主题，强调现代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大力扶持青年才俊；另一方面，全面落实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进一步加大了与国际学术刊物规范接轨的力度，不断提升《经济评论》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27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28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全国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排名第4；根据最新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在全国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期刊的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位居第5。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http://jer.whu.edu.cn>)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er@163.com
